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翻譯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日口譯研究發展趨勢比較：2014 到 2021 年

Research Trend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from 2014 to 2021

李蕙瑄

LEE, Hui-Hsuan

指導教授：汝明麗 博士

Advisor: JU, Ming-Li,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謝誌

本研究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乃是託汝明麗老師的福。沒有老師擔任指導教授一路悉心指導，學生絕對無法自力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同時也要感謝口試委員廖柏森老師以及李姿瑩老師，兩位教授仔細地閱讀學生的論文，給予寶貴的回饋與建議，學生的研究才能順利完成。

另外還要特別感謝我的泰拳教練瓦恰拉。寫論文是一個漫長且煎熬的過程，期間遇到很多挫折，承受很多壓力，皆是靠泰拳訓練獲得排解。感謝教練總是很有耐心的傾聽我滿腹苦水，儘管因為語言隔閡，大部分的時間您都不懂我在抱怨什麼，但仍然很感謝您在我明顯情緒低落的時候，陪我訓練幫我分散注意力，用您的方式讓我打起精神，訓練完後我總是能重新振作再出發。

最後，學生也要感謝三年研究所期間教導學生的各位教授。謝謝范大龍老師、陳子瑋老師、蔡嘉瑩老師、張梵老師，以及本論文指導教授汝明麗老師，正是因為有如此專業強大的師資在背後鞭策學生努力向學，學生的口譯學涯和職涯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

摘要

台灣的翻譯學研究發展至今，已經產出大量的口筆譯研究，而目前針對口譯研究，已有廖柏森(2007)、何承恩(2013)、徐郁雯(2014)等人進行回顧，審視從 1997 年至 2013 年之進展。本研究延續前人之研究(廖柏森，2007；何承恩，2013；徐郁雯，2014)，蒐集 2014 至 2021 年間的口譯論文，透過傳統文獻回顧以及非傳統的演算法工具，分析研究數量與佔比、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語種、研究撰寫語言等面向，釐清台灣口譯研究發展趨勢，同時也與日本進行比較，探討兩國口譯研究發展有何異同。

結果發現，台灣口譯研究趨勢與過去十幾年相比，變化最顯著為研究主題以及研究方法：過去教育相關主題為熱門研究題目，變為實務相關研究數量大幅領先，後者則從過去質性研究法為重轉為質性與量性並重。台日比較方面，本研究發現日本口譯研究佔總體翻譯研究比較台灣高出許多，其他面向則與台灣類似。本研究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期待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找出台灣可借鏡之處，以利口譯研究未來發展。

關鍵字：台灣口譯研究、日本口譯研究、口譯研究回顧、演算法、文本分析

Abstract

Taiwan has produced its fair shar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up to this point. Liao (2007), Ho (2013) and Xu (2014) have conducted meta-analyses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nterpreting studies, presenting a clear picture of progress made in the discipline between 1997 and 2013. This study aims to build on Liao's (2007), Ho's (2013) and Xu's (2014) research by analyzing Taiwa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between 2014 and 2021. Traditional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unconventional, algorithm-based content analysis tool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factors including the share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mong all Taiwa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studied language, and languages in which studies are published, in the hope of identifying the research trend of Taiwa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compares interpreting studi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highlight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aiwanese interpreting study compared with nearly a decade ago: profession-related issues have overtaken education by a large margin to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topic,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s now widely adopted by Taiwanese researchers. In terms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the share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in overal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Japa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aiwan, there are no other pronounced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preting stud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this study identified areas where Taiwan's interpreting research community can improve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Keywords: Taiwa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Japa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algorithm-based analysis, meta-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目次

謝誌.....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表次.....	vii
圖次.....	ix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3
第三節、研究範圍	5
第二章、文獻回顧.....	6
第一節、口譯活動發展史：比較台灣與日本	8
壹、日本口譯研究發展里程碑：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	13
貳、台灣口譯活動進展.....	17
第二節、日台口譯研究活動比較.....	21
壹、研究主題：口譯型態別	21
貳、推動口譯教育訓練之機構	25
第三節、日台主要翻譯研究期刊.....	34
第四節、台日口譯研究回顧	44

壹、後設分析.....	44
貳、日本口譯研究回顧.....	46
參、台灣口譯研究回顧.....	48
肆、台日口譯研究回顧綜合比較	53
第四節、口譯研究發展脈絡	56
第三章、研究方法.....	59
第一節、研究資料	59
第二節、研究方法	62
壹、研究步驟.....	64
貳、研究工具.....	65
第四章、研究結果.....	70
第一節、台灣口譯研究統計結果.....	70
第二節、台灣口譯研究文本分析結果	78
第三節、日本口譯研究統計結果.....	84
肆、日本口譯研究文本分析結果	91
第五章、討論.....	98
第一節、台灣口譯研究過去與現在之比較.....	98
第二節、台灣與日本口譯研究趨勢比較.....	102
第三節、其他研究發現.....	107
第六章、結論.....	109
第一節、總結	109

第二節、研究貢獻	110
第三節、研究限制	111
壹、日本研究並無納入學位論文	111
貳、日本期刊論文收集數量不夠大	112
參、台灣學位論文多數無法取得全文	113
肆、文本分析量能有限	113
第四節、未來研究建議	114
參考文獻	117

表次

表 2- 1 日本通譯翻譯學會沿革年表	32
表 2- 2 日本翻譯研究期刊一覽	36
表 2- 3 何承恩(2013)與徐郁雯(2014)之研究結果比較：研究主題別	55
表 2- 4 何承恩(2013)與徐郁雯(2014)之研究結果比較：研究方法別	56
表 3- 1 研究素材一覽表	60
表 4- 1 台灣翻譯學研究數量統計(2014-2021)	71
表 4- 2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主題	72
表 4- 3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方法	73
表 4- 4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混和研究方法類別	74
表 4- 5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語言組合	75
表 4- 6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撰寫語言	76
表 4- 7 台灣口譯研究標題文字雲之前十大趨勢詞	79
表 4- 8 台灣口譯研究內容分析文字雲之前十大趨勢詞	80
表 4- 9 台灣口譯研究十大趨勢詞	82
表 4- 10 日本翻譯學研究數量統計(2014-2021)	85
表 4- 11 日本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主題	86
表 4- 12 日本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方法	87
表 4- 13 日本口譯研究統計資料：混和研究方法類別	88
表 4- 14 日本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語言組合	89
表 4- 15 日本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撰寫語言	90
表 4- 16 日本口譯研究標題分析文字雲之前十大趨勢詞	92

表 4- 17 日本口譯研究內容分析文字雲之前十大趨勢詞	94
表 4- 18 日本口譯研究十大趨勢詞	95
表 5- 1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口譯研究佔比變化	98
表 5- 2 台灣口譯研究統計資料：研究語言組合變化	99
表 5- 3 台日期刊論文比較 (2014-2021 年)	102
表 5- 4 台日期刊論文撰寫語言比較	103
表 5- 5 台日期刊論文研究主題佔比比較	104



圖次

圖 3-1 TF 的計算公式.....	68
圖 3-2 IDF 的計算公式.....	68
圖 4-1 論文標題分析文字雲	78
圖 4-2 論文內容分析文字雲	80
圖 4-3 台灣口譯研究語意網絡圖	83
圖 4-4 日本論文標題分析文字雲	91
圖 4-5 日本論文內容分析文字雲	93
圖 4-6 日本口譯研究語意網絡圖	97

第一章、緒論

本章首先介紹研究背景與動機，並提出研究欲回答的兩大研究問題，最後在第三節界定本研究範圍。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全球化勢不可擋，隨著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網路的普及，世界各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成為常態，特色各異的文化和語言之間的交流也愈趨頻繁。國際化發展的浪潮也讓翻譯的重要性水漲船高，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不僅是產業界，學術界對於翻譯活動的關注也有增長之勢，除了各國學術機構也開始廣設翻譯系所、提供相關訓練課程之外，新聞媒體對於口譯活動也有多加報導，坊間也有許多口筆譯專書的出版，這些現象都指向了翻譯作為一門專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的事實。

翻譯這門學科若再進一步細分，又可以分出筆譯與口譯兩門子學科，兩者所需的技巧及訓練方式大不相同，因此上一段提及開設翻譯研究所的大學，也有不少採用把學生分成筆譯組與口譯組個別訓練的作法，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研究；雖然兩者都屬於翻譯，但所使用的媒介、技巧以及所需訓練都不同，因此研究時也不宜混為一談，而本論文選擇聚焦於口譯研究。

回顧台灣翻譯的學術研究發展，從第一間專業翻譯系所和學術機構成立，至今也已經有近 35 年的歷史，是時候回顧過去成就，放眼未來發展趨勢。目前對國內口譯研究進行統整性回顧的文獻不多，包括廖柏森(2007)的「台灣口譯研究現況之探討」、何承恩(2013)的「台灣口譯研究現況：2004-2013 趨勢發展」，以及徐郁雯(2014)的「兩岸口譯研究現況：2004-2013」，最後這篇雖然主題是兩岸口譯研究的比較，但是文獻回顧也有整理出台港口譯研究的發展作為背景知識。距離何承恩(2013)和徐郁雯(2014)的研究發表已經又過了將近 10 年，期間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發明推陳出新，尤其人工智慧及口譯輔助技術與軟體不斷精進，對於翻譯這項專業造成極大的影響，勢必也成為研究焦點，因此是有必要再進行一次回顧型研究。

探討國內的口譯研究發展之餘，也應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以便從不同的角度剖析口譯研究演進的脈絡，探索未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正如日本翻譯名家近藤正臣(2001)所言，翻譯是一項牽涉多種語言和思想的跨文化活動，如果沒有和其他國家進行交流，那麼口譯研究也無法反映口譯這項活動的本質，因此除了探討國內研究的發展之外，也有必要分析他國研究現況找出發展的特點以及缺失，藉此借鏡他國經驗，避開學術發展路上可能碰到的問題，也警惕不要重蹈他國的覆轍，台灣口譯研究也能有機會發展得更健全更順利。

進行台灣相關比較研究時，大多以中國為比較對象，但這次筆者選定日本，進行台日比較研究，原因在於，中國雖然語言文化與台灣相近，作為比較對象甚為理想，但目前已經有前人(徐郁雯，2014)做過類似研究，因此這次選定和台灣一樣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甚深，且同樣深受西方口譯理論影響的日本為研究對象，期透過比較找出發展的異同之處。此外，日本跟其他歐洲國家或美國相比，情況跟台灣似乎比較類似，因此日本的發展經驗套用到台灣，可能也相對容易，實用價值因此較高。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比較台日口譯發展，回顧台日口譯研究相關研究。除了透過量化研究方法找出學術界的主流論述之外，也分析研究的特質，期能更完整的呈現兩國口譯學術圈的生態。台灣的口譯研究活動方面，本研究接續何承恩(2013)及徐郁雯(2014)的研究，統整過去研究結果的同時，也更新台灣口譯研究數據，以利與日本比較。日本研究方面，本研究深入剖析日本的翻譯史以及口譯發展到目前為止的進程，並歸納出日本口譯研究的脈絡。透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看出同樣奠基於西方翻譯理論的台灣及日本有什麼樣的差異，以及未來有什麼可能的發展方向。

本研究參照廖柏森(2007)、何承恩(2013)與徐郁雯(2014)的回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整理過去翻譯研究文獻，蒐集主要翻譯期刊論文並利用內容分

析法取得數據，但與前人不同的是，本研究另採用後設研究時使用的量化研究工具，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台日口譯學術界的研究趨勢。

本論文欲回答的問題如下：

1. 2014 至 2021 年間，台灣口譯發展方向是否與前人(廖柏森，2007；何承恩，2013；徐郁雯，2014)之研究有所差異，以及有哪些新的研究趨勢？
2. 台灣與日本的口譯研究中有什麼樣的發展差異？日本口譯發展又哪些台灣可借鏡之處？

除了回答上述研究問題外，日本口譯研究有哪些特質，日本學術界又有什麼經驗和做法可以提供台灣參考，也值得探討。例如，兩國研究雖然多建立在西方國家提出的理論基礎上，但是從日本口譯研究期刊來看，日方較多介紹及分析國外翻譯理論之投稿論文及書評，甚至將著名的翻譯理論書籍翻譯成日文，也有不少學者在西方理論基礎上加入自己的見解，提出新版本，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翻譯期刊似乎比較少見，理論書籍的翻譯也比較少。本研究透過分析日本主要翻譯期刊之論文，歸納出日本口譯研究發展有別於台灣之處，並參照日本的做法，期能為台灣口譯研究提供更明確的發展方向，鼓勵圈內學者在未來進行更多研究。

第三節、研究範圍

時間方面，本研究延續何承恩(2013)與徐郁雯(2014)的研究，探討台灣口譯研究在 2014 年到 2021 年之間的變化與大趨勢，同時也回顧作為比較對象的日本在同一期間內的口譯研究。另外，為了提供更清楚的研究問題脈絡，本研究也將介紹日本口譯活動的歷史，焦點主要放在明治維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及進入 21 世紀後的近代口譯發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台日口譯研究論文，來源為兩國主要的翻譯學術期刊，台灣方面選定了《編譯論叢》以及《翻譯學研究集刊》作為對象，而日本方面則是《通譯翻譯研究》以及《來自通譯翻譯研究的邀請》，有鑑於兩者皆為同一個研究機構的出版物，因此日本的資料蒐集對象再納入由日本英語傳播學會(日本英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所刊行之《日本英語傳播學會紀要》。以上期刊之背景與特色將於第二章詳述。

第二章、文獻回顧

口譯作為一門學科踏上學術發展之路跟一個國家的歷史及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因此回顧口譯研究發展時，不能單看近代學術動向，而應綜觀時間軸上的縱向變化，才能有效釐清全局。進行口譯研究時強調翻譯史的重要性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作法。Mona Baker(2001)就主張，目前學界缺乏對翻譯史的關注，但是透過研究翻譯史仍可獲取許多有助益的資訊，諸如特定時代翻譯或口譯人員的整體能力、口筆譯員在不同時期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族群對於兩者有什麼樣的看法，進一步分析上述的資訊，便有機會開發出新的研究領域，進而探索翻譯及口譯研究的不同面向。因此，本章將先介紹 Gile(1994)針對口譯研究發展提出的脈絡與階段，接著從歷史的角度深入探討日本以及台灣的口譯活動發展，最後再回頭參考 Gile(1994)所彙整出的口譯發展四階段，推斷台日口譯發展大致進行到哪一個階段。

口譯活動在世界各地盛行，東西方各有不同樣貌，學術界的樣態也不例外，但西方口譯研究整體結構較完整，理論的基調也相對紮實，此乃因西方口譯研究興起的時間早，發展時間較長，因此也相對成熟。

20 世紀正好是一個關鍵時期，口譯作為一項遍佈世界各地的專業逐漸興起 (Pöchhacker, 2016)，兩次世界大戰後皆出現大量會議口譯需求，開啟了口譯活動專業化的進程，這樣的發展也喚起了學界的注意，隨後開始有不

少學者針對口譯活動，特別是會議口譯，進行研究。隨著時間的推進，口譯研究的題目越加多元，論文數量也不斷增長，其中，Gile(1994)便回顧了西方口譯研究動態，根據截至1994年止的發展，回推出口譯研究發展的脈落。

Gile(1994)把口譯研究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初始期始於 1950 年代，當時的口譯研究多為專業口譯員基於自身經驗所做的詳細描述，並無太多科學要素，首篇可以稱得上是口譯學術研究的則是 Paneth(1957)在倫敦大學教育系撰寫的碩士論文。

第二階段則是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實驗心理學時期。Paneth 發表論文後，Gerver 等知名的心理學家與心理語言學家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口譯研究期間口譯員的心理變化，此時口譯研究逐漸成為一種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活動。此階段也開始出現一些口譯理論，主要環繞在口譯過程以及口譯員對於原語、目標語、語速等要素的反應以及受到的影響等，但此階段的研究數量不多，學者對於口譯的認知理解尚淺，許多研究的有效性仍待探討，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也令人懷疑(Gile, 1994)。

第三階段則是業界人士投入期，時間大約落在 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此時期進行口譯研究者多為在學術機構任教的業師，以提出假設占多數，較少用實驗或觀察支持理論或證實假設的實證研究，本階段也出現了許多作為近期許多口譯研究基礎的模型，Gile(1990) 的氣力模型就是一個

例子。除此之外，還有關於口譯訓練教學等理論架構出現，這可能也是研究者多半為教師所致，研究人員在教學現場透過觀察及自身經驗，比較容易歸納出一套系統。不過，礙於語言隔閡、政治因素及種種原因，此時期學界內甚少有研究交流，學者多半閉門造車獨力完成研究，內容說不上是完善 (Gile, 1994)。

上述的情況進到了第四階段，也就是 1980 後的「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才逐漸改善。Gile (1994)點出，劃分文藝復興時期與上一個階段的分水嶺為 1986 年。當時的里亞斯特大學招開口譯教學學術研討會，提出各項精進口譯學術研究的訴求，諸如增加實證研究，鼓勵學者之間的交流等。這個時期也有更多研究採用筆譯或是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理論做為研究基調，有了其他領域研究結果佐證與支持，口譯學說也因此有更加穩固的論理基礎。在同一時期，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 (AIIC) 也成立了研究委員會，進一步鞏固口譯作為一門研究學科的地位。

第一節、口譯活動發展史：比較台灣與日本

本節首先介紹日本口譯活動發展史，主要參考 Toriaki (2006)以及佐藤 (2004)的博士論文，整理出日本口譯實務之變化：前者提供從 17 世紀至 20 世紀的口譯活動發展概況，後者則是呈現 20 至 21 世紀口譯產業的演進，彙整兩者的結果，即可得出一條縱向時間軸，呈現日本口譯活動的演進。口筆譯在日本的歷史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於 1603 年至 1868

年間實施鎖國政策，唯一對外的門戶僅剩長崎，日本與外國的互動也僅限於荷蘭與中國，而其中日本與荷蘭的交往又更為頻繁，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蘭學，亦即荷蘭傳入的學問，開始蓬勃發展，貢獻日後日本明治維新及近代化的發展。蘭學的發展中，口筆譯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德川幕府的口譯系統(鳥飼，2001；Toriaki，2006)。

日本口譯活動記錄最早可追溯至西元七世紀，當時有所謂的「唐通事」，負責透過口筆譯工作促進日中兩國貿易(Toriaki，2006)。Toriaki(2006)在研究日本口譯活動史時參考了 Hayashi(2000)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口譯與現代不同，根基於日本封建體制，為家族企業，職位代代相傳，唐通事間有明顯的階級之分 (Toriaki，2006，p.63)。早期的唐通事很成功建立起一套極為嚴謹的系統，包含訓練跟檢定制度的，甚至還有職業規範，系統內設立一位通事長，掌管整個口譯員組織。該體系在 17 世紀也成為了政府公務口譯員制度的基礎。1604 年，德川幕府接管做為唯一對外港口的長崎港，同時官方也正式承認口譯員這個職業的存在，並將口譯納入官僚系統，以利日後管理(p.62)。這些在長崎港為德川幕府工作之口譯員稱為「荷蘭通事」，性質屬於政府公務人員，負責透過口筆譯工作推動與荷蘭的各項交流，包含貿易、知識與外交層面，且工作內容除了口筆譯之外，還必須從事行政業務。由此可見，日本自德川幕府時期開始，即以系統性的方式管理口譯這項專業。(Toriaki，2006)

江戶時期的口譯員活躍於各種官方與外國人接觸的場合，協助德川幕府代表與外國人溝通。Toriaki (2006, p.64)以 Semizu(2001)的研究佐證，點出這類的口譯活動建立了日後對話口譯工作的雛形，也確立了口譯工作的根本存在意義，亦即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交流。上述例子再一次說明，從歷史角度探討日本的口譯發展有其必要性，因為可以重新審視現代為口譯工作以及口譯員塑造的職業形象。

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透過翻譯文獻以及派駐他國的口譯員學習西方新知，這些語言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了西方知識技術流入日本，成為日本戰後國家重建的重要基石 (Toriaki, 2006, p.64)。其中一位較知名的翻譯兼口譯員便是眾所周知的福澤諭吉。除了翻譯西方學者所作之重要經濟著書，福澤諭吉也曾以日本政府口譯員的身分派駐歐洲，晚年也曾在自傳中回憶當時以口譯幫助日本接觸歐洲文明的經驗(Toriaki, 2006, p.66)。

時間來到戰後，又有新的一批口譯員崛起，這些人受雇於日本政府的日本生產力中心(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陪同日本大使前往美國，學習工業及商業知識，這些人將美國習得的學問帶回日本，以推動日本戰後社會重建(Toriaki, 2006, p.68)。Toriaki (2006)訪問的口譯員中，就有三位是當時日本大使的隨行口譯員。為了要推行上述計畫，日本政府判定必須要訓練隨行口譯員，口譯再次作為一項專業受到政府的肯定。

Venuti(1995)主張，翻譯是一項幕後的工作，譯者隱藏在譯文之後，好的譯文讀起來行文自然，不像翻譯產物，因此譯者往往不會受到大眾的關注。口譯員亦面臨類似的狀況，礙於口譯工作性質，口譯員往往隱身於幕後口譯廂等一般人目光無法觸及之處，曝光度極低。不過，日本獨特的歷史發展卻給了口譯員現身於大眾面前展現專業的機會。Toriaki (2006)就於論文中提到日本史上三個提高民眾對口譯員認識的重要契機，以下摘要描述。

根據 Toriaki(2006)的研究，第一個契機是二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身為戰敗國的日本需與各國簽訂敗戰條約，並擔負戰爭損害賠償的責任，以及戰爭罪相關的刑責，戰後對日本的法律訴訟排山倒海而來，其中最大規模者就屬當時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會場內架設有口譯廂，以利當時的口譯員進行同步口譯 (Toriaki, 2006, p.67)。接著 1950 年於瑞士舉行的道德再武裝(Moral Re-Armament, MRA)會議，當時為活動提供同步口譯服務的為日本早期的口譯員西山千以及相馬雪香 (Toriaki, 2006, p.68)。此外，許多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工作過的口譯員後來都轉往聯合國，活躍於國際會議的同步口譯員大幅增加(Toriaki, 2006)。

第二個增加口譯員曝光的契機則是 1969 年美國登月計畫(Toriaki, 2006, p.68-69)。當時日本民眾可以即時收看新聞轉播美國阿波羅號登月的動態，提供轉播的電視台則聘請口譯員把美國太空總署(NASA)以及太空人

之間的對話即時口譯成日文，成為日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首次眼見、耳聞口譯員工作之契機 (Toriaki, 2006)。

第三個契機是 1970 年代的各種大型國際活動，其中以東京奧運和大阪萬國博覽會規模最大。大阪萬博當時雇用了 150 位女性口譯員，在會場進行口譯及導覽工作。有別於 1969 年阿波羅計畫的轉播，這次民眾可以親自與口譯員接觸，實際在現場了解口譯員的工作流程，一窺口譯員工作的全貌，也有不少人受到啟發而踏上口譯員之路。朝日新聞在 2018 年進行的 2025 萬博系列報導中採訪了曾參與 1970 年大阪萬博的宮本良子女士，受訪時她表示，當時大學四年級的她作為活動志工接待外賓，切身感受到世界是什麼樣的感覺，大受啟發而在畢業後開始學習英語翻譯，40 歲時開始從事同步口譯，之後的職涯中曾經替達賴喇嘛 14 世口譯，也出席許多國際會議。1970 年代這兩大國際活動提供口譯員在大眾面前活躍的舞台，能見度提高也似乎也賦予口譯更高的社會地位(古野，2002)，民間訓練機構隨即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佐藤，2004)。

回顧日本歷史，不難看出在各階段，翻譯這項專業均獲得政府的肯定，日本政府重視與外國的交流，也了解解口譯員在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從最早江戶鎖國時與荷蘭的交流，到二戰之後頻繁的與國際社會接觸，還有美國登月，以及東京奧運、大阪世博等，各種活動以及國際

場合都再次強調了對外交流在日本歷史上不可抹滅的重要性，透過與其他國家的交流，日本得以接收新知、新文化、科技等，為日本的軟實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而口譯員正是在背後促進這些交流的功臣，這或許也說明為何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口譯人才頗為重視。

由於以上的發展歷程，包含口譯工作的翻譯專業早在江戶時期即自成一個嚴謹的職業體系，且後續又有各種歷史事件，讓口譯受到政府與社會認可。此外，雖然翻譯活動在各個時代也有持續進行，但口譯員相較於筆譯員能見度較高，各種活動會議都可見口譯員提供口譯服務，後期新聞轉播更是可以直接看到口譯員工作實況，上述狀況皆提升了口譯員的能見度。

壹、日本口譯研究發展里程碑：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

日本近代史還有另一項對口譯研究發展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性要素，即是 1998 年文部科學省召開的第 22 次國語審議會(亦即日語審議會)。國語審議會乃日本重要的國家語言方針會議，首先於 1934 年成立，2001 年廢除，併入日本文部科學省主持的文化省議會下，而本小節所討論的 22 期即為最後一次。在成立到廢止間，國語審議會在日文發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會議中提出不少具重大意義的日文政策與方針，作為現代日文發展的定錨，代表性成果包括提出常用漢字表、羅馬拼音化政策等。除了實際提出的政策之

外，國語審議會在相對抽象的理念層面也有諸多貢獻，其中較為顯著的便是本研究深入探討的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結果。

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中，有數個委員會針對日語方針進行討論，其中第三委員會以「國際社會中日文應有的樣貌」為題展開深度討論。該委員會討論的方向主要有三，分別為國際社會中日文的定位、日文國際化的進程，以及伴隨國際化而來的各種日文的問題。其中，與口譯較有關連的就是日文的國際化：國際化的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就是向國際社會散佈日文的情報與資訊，為達成此目的，勢必須借助口譯及筆譯的力量。

第 22 次國語審議會的提案意義重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長時期位於知識接收端，首先，自飛鳥時代¹起，日本開始接納中國的遣唐使來日，吸收中國文化。進到江戶時代，雖然實施了鎖國政策，但德川幕府仍積極與荷蘭交流，發展有蘭學之稱的荷蘭知識體系。接著進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持續學習西方技術，充實日本軍力。最後到了二戰後，日本為了重建受到戰爭摧殘的國家而前往美國學習各項技術。不旋踵間日本躋身已開發國家之列，各項知識技術的發展益趨成熟。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主張，日本是時候從知識接收端轉為發送端。在各國緊密連結的國際地球村中，要輸出日本的文化、知識、技術勢必就要仰賴以國際共通語言英文為主要媒介，日文及英文兩種

¹ 古代日本的一段歷史時期，具體為西元 592 年至 710 年間。